

2002 年華南研究年會綜述

田宓
中山大學歷史系

2002 年 12 月 21 日，由廣東省歷史學會中國社會經濟史專業委員會、華南研究會、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歷史系合辦的 2002 年華南研究年會，在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永芳堂召開。有來自美國、英國、日本、香港、北京和廣州等地的五十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年會。會議為期一天，共分五個部分，與會學者就會議內容展開了熱烈討論。以下是對本次年會的綜述。

第一部份

會議首先討論了有關外銷畫的問題。周湘（中山大學歷史系）、程美寶（中山大學歷史系）和江瑩河（中山大學歷史系）三位學者在會上做了主題發言。他們報告的題目分別是「外銷畫中的製茶圖」、「外銷畫中的製絲圖」、「外銷畫中的船」。三位學者指出對這批畫的研究是為明年與英國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聯合舉辦的展覽會做準備，報告所用圖片均來自阿爾伯特博物館。幾位學者對外銷畫出現的背景，製作的目的和過程做了介紹。他們認為外銷畫的出現與十八世紀西方國家出現的中國熱有關。西方人或出於好奇，或出於研究的需要，讓那些能夠來到中國的人，把一些有關中國風情的畫帶回本國，外銷畫由此產生。外銷畫通常以一個模本為參照，成批量生產。因此，畫中會發生同一形象人物出現在不同時空背景下這種令人匪夷所思的情況。

周湘和江瑩河報告中的外銷畫屬同一類型，都是包括製茶、製絲比較完整過程的系列畫。他們認為製茶圖、製絲圖體現了明顯的性別分工：男子多從事體力活，婦女則多從事一些不需要付出太多體力，但需要耐心細緻去做的工作。程美寶在報告中介紹了鹽船、販米船、橫水渡等不同類別的船隻，同時分析了船隻運貨種類與海關稅收之間的關係。她認為畫中的許多船，畫工並未親見，在畫的創作過程中有主觀臆想的成分。這

也是幾個學者得出的一個共同的結論，他們指出畫工對他們要畫的東西，並不完全瞭解。畫中經常會發現一些明顯的錯漏之處。畫中內容與實際情況出入很大，想像與現實出現差距的原因很複雜，是以後研究要進一步努力的方向。他們同時指出在研究這批畫時，目光不能只停留在畫本身，還要善於捕捉畫外的東西，看到畫外反映了怎樣的社會生活的場景。

也有學者認為：畫是一個內涵豐富的資訊載體，不能簡單地判定畫的內容是對是錯，今天我們看來是錯的，在過去可能會被看作是合乎常理的。趙世瑜（北京師範大學）指出：畫是形象的史料，要把它放在歷史的進程中進行研究，從方法論的層面進行討論，要明確研究的目的，不僅要研究畫中透漏的是那一種歷史資訊，還要討論畫者和看畫人的關係，這些都是複雜的社會思想史的內容。

第二部份

會議第二部分主要討論人口增減與農業發展的關係，糧食商品化對地方社會的影響以及明代北京城鋪戶與當時社會政治經濟關係的問題。張瑞威（華南研究會）、黃永豪（中山大學歷史系/華南研究中心）和胡海峰（中山大學歷史系）分別作了「清初農業的發展——量與質的探討」，「米禁與米價上升——二十世紀初年的湖南」，「明代北京城鋪戶研究」專題發言。

張瑞威探討十八世紀長江流域米糧市場的出現。他指出何炳棣、德懷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和伊懋可(Mark Elvin)等利用古典經濟學的報酬遞減律和馬爾薩斯人口論，論證中國尤其是江南地區在十八世紀出現人口壓力，至少存在兩個問題。首先，人口過剩論認為中國人缺乏歐洲人的理性，所以只能用戰爭，瘟疫和饑荒來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這樣的論調本身缺乏說服力；

而近年李中清、王豐和李伯重亦已證明，中國人也會理性地用溺嬰、遲婚等手段控制人口的增長。其次，亦是人口過剩論的最大弱點，就是它缺乏一套證明人口過剩的糧食價格。全漢昇以往所強調中國在十八世紀末因人口壓力而出現的物價革命，已被王業鍵最新的米價統計所否定。既然人口過剩論已經站不住腳，那麼以往人口過剩論能解答的問題，應如何理解？特別是長江流域米糧市場出現的動力是甚麼？張瑞威認為，要找出這個動力，須先了解當代江南人吃用大米的背後意義，以及釐清在江南市場上不同品種稻米的質量和價格。他指出，十八世紀江南人消費稻米，是富裕的象徵；而當時江南的米糧市場，大體分為兩個層次：富裕的江南人，享用質量較好、價錢較高的本地米；但那些不太富裕而又不願吃小麥等雜糧者，只好吃用價錢較廉的湖南米或四川米。由於後者在江南的數量多，湖南米和四川米便有市場，長江流域的米糧市場由是發展和整合。

黃永豪的發言主要是探討湖南米價上升與當地禁止米糧出口訴求之間的關係問題。二十世紀初期湖南百姓不滿米價的急速上升，因而強烈要求地方政府禁止米糧出口，但官府禁止米糧出口的時間，多在初夏，正是米糧供應青黃不接，米價季節性上升之時，這一時期，也正是各行各業的商業活動開始活躍，大量動用資金之時，白銀兌換銅錢的價格上升，升斗小民以銅錢購買米穀便會發現米價已經上升。而且這個時候，湘江水位較淺，不能通航大型船隻運輸米糧，因此往往並不是湖南米穀大量出口的季節。可見除了米穀出口外，還有很多因素影響米價上升，但是湖南百姓把米價上升完全歸結於米穀出口，把米穀出口與米價上升視為二而為一的東西，這反映出，他們強烈的反對把米穀變成對外貿易的商品。這種反對的聲音對當地社會有怎樣的影響是一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話題。

胡海峰在「明代北京城的鋪戶研究」中解釋了鋪戶的含義及其在明代變化的情況。他認為必須把明代北京城的鋪戶放在明代城市的坊廂體制和鋪戶的主要徭役——買辦中進行考察。鋪行的

主要徭役是買辦，買辦制度從建立，完善到明朝中後期發生很大變化都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密切相關，反映了有明一代的社會變遷。

第三部份

第三部分探討的是宗教信仰方面的問題。游子安（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和潘淑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分別做了「尋源記——從香港到清遠的先天道堂」和「廟宇與國民改造——二十世紀廣州城隍廟的變化」的主題發言。

游子安在他的發言中，闡述了粵港先天道堂百年來的發展歷史。游子安指出香港的先天道堂與廣東的祖堂一脈相承。香港先天道堂的源頭就是廣東清遠的藏霞洞，瞭解此道派源流，有助於瞭解香港道堂的歷史與現狀。飛霞洞也是香港道堂的源頭之一，但創建的年代要晚於藏霞洞。游子安曾兩次深入實地進行考察，對藏霞洞和飛霞洞內部的格局和舉行的儀式都有詳細的記錄，他認為藏霞洞不僅是粵港先天道堂的源頭也是其發展的縮影，今天的藏霞弟子依然刻守傳統，重視禮儀，但是面臨著宗教人才缺乏，後繼無人的現實問題。

潘淑華的發言闡釋了二十世紀廣州城隍廟屢經變遷的情況。城隍廟在解放前，隨著政局的變化被改造成不同的樣貌。1911年以前，城隍廟是官方的廟宇，是皇權在地方延伸的象徵，1911年以後，在一片追求現代性的呼聲中，城隍廟被視為封建的東西，屢經打擊。先是變成了學校，以後又變成國貨市場，但城隍廟並沒有因此喪失其宗教意義，城隍廟變成國貨市場以後，人們依然為城隍保留了一隅之地，繼續到那裏拜城隍，政府要破除迷信，對城隍廟進行打壓，但普通百姓並不因此停止對城隍的參拜，由此可見，傳統與現代，地方與國家並不能簡單對立，截然兩分。

第四部份

會議第四部分是對12月16日至12月20日為期五天的海南歷史文化考察進行的總結報告。與會的陳春聲（中山大學歷史系）、劉志偉（中山

大學歷史系)、蔡志祥(香港科技大學)、科大衛(牛津大學)和濱下武志(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十九位專家學者也參加了這次考察活動。賀喜、黃國信在會上作了總結發言。

報告首先介紹了海南的歷史建制。海南開發年代很早,漢代這裏就設有珠崖郡(今海陳南),詹耳郡(今詹州市東北部),以後歷朝歷代在海南都有正式建制。接下來他們介紹了本次考察的行程。考察大致是從沿海地區開始最後到達海南腹地——五指山。沿途參觀廟宇、祠堂、書院、名人故居、村寨和墓地多處。

賀喜、黃國信在會上,結合圖片,談了對參觀新坡鎮冼夫人紀念館、五公祠、海瑞故居、東坡書院、黎村苗寨、瓊山會館和伊斯蘭教墓群等地的印象和體驗。在報告中他們指出:海南地區有著自己獨特的商業貿易和信仰體系。它與東南亞、環南中國海一帶以及北部灣地區構成一個複雜的商貿網路,海南在這個商貿網路中扮演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其地位的重要性與海南鹽的生產與貿易以及米糧的貿易有關。海南的信仰體系也是錯綜複雜,冼夫人信仰、佛教、道教和伊斯蘭教在這裏都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各種信仰雜錯交織,以往大家熟悉的華南模式在這裏缺乏解釋力。總之,海南歷史有自己獨特的發展軌跡,他們認為在這次考察之後,對海南的印象不是變得清晰,而是變得模糊了。這也引導學者對海南地區的歷史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第五部份

最後與會學者就這次會議的內容談了各自的想法和體會。

葉顯恩(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從自己的研究經歷出發,對非文字史料和田野考察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應用給予肯定的評價。他認為,華南研究年會七年的成長歷程中,每一年都有新的內容,都給參加會議的人帶來新的啟發。本次年會三位年輕史學工作者關於外銷畫的報告,在史料的運用上就很有新意。他指出在進行有關人口與農業發展關係和糧價問題的研究時,要充分考慮到問題的複雜性,堅持多因論而不是

單因論,因時因地的進行討論。他說自己的研究也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起初是追求普遍的規律,而後是套用模式,但是規律和模式都會不同程度的掩蓋事物的差異性。所以他現在講的是特定的傳統。最後他還介紹了他近兩年來著力研究的一個區域——徽州,他認為徽州是傳統文化傳承的典型,與華南地區大相異趣,如做比較研究將會很有意義。

濱下武志(東京大學/京都大學)認為畫具有文字史料所不具備的空間感,用來做歷史研究,在史料上有創新。在談到這次海南之行時,他認為海南伊斯蘭教發展的歷史要與環印度洋的歷史背景聯繫起來考察。西洋商人與海南島的貿易關係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他還特別談到在日本現有大批有關中國的史料可在網上利用,其中涉及海南島的資料在日本三個檔案館都有收藏。這批史料的運用將會幫助我們瞭解海南的歷史。

蕭鳳霞(耶魯大學)主要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說歷史學與人類學兩個學科之間在不斷地相互滲透,以前很少有人做這方面的工作,但是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不再囿於學科的偏見,加入到這種跨學科的研究中來。歷史學與人類學都從對方身上汲取了許多有價值的東西。多元的歷史的研究過程對人類學來講,是一個非常有用的工具。而要聆聽許許多多不同的聲音,學者們也必須在批判地利用文獻的同時,腳踏實地地走進田野中去。這種學科間的互利互惠在他們的研究成果中都有充分的體現。

周大鳴(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海南島的考察是對底層社會的考察。雖然考察的物件是很底層的東西,但背後關懷的是很大的問題,也就是神聖權威與世俗權威的關係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東西方存在很大的差異。在中國皇權始終凌駕於神權之上,世俗權威對神聖權威的打擊屢有發生。面對世俗權威的打擊,神聖權威通過多種手段應對,適應的策略通常是與正統連接起來,把自己納入正統的範疇。他們之間的這種相互鬥爭與妥協體現了國家和社會之間即對立又統一的互動關係。